

一声古腔,六百年回响

——新昌调腔的坚守与新生



■ 本报记者 金汉青

锣鼓骤然敲响,没有丝竹管弦铺垫,一道清亮婉转的唱腔破空而出,质朴而有力的声音瞬间便攫住了台下观众的耳朵——日前,新昌调腔经典剧目《闹九江》在新昌县桂芳大剧院上演。

新昌调腔,亦称掉腔,绍兴高腔或新昌高腔,发源于新昌,曾广泛传唱于绍兴、萧山、上虞、余姚等浙东地区,是我国古老高腔剧种的典型代表,更被不少专家称为戏曲史上的“活化石”。这个古老的剧种,距今已绵延约六百年。它的艺术形态中,留存着大量古代戏曲与音乐的原始印记,成为研究古代戏曲与音乐的珍贵样本。而今,它正在迎来更多新鲜的面孔和年轻的剧迷。传承六百年的新昌调腔,为何今天还能让人心动?

油、气息的稳乱,台下一听便知。”

1942年出生的章华琴,15岁考入新昌调腔训练班,她对练腔的细致严谨尤有体会。有时候,一个字就要磨上三个月。譬如“崔莺莺”三字,“崔”要轻,轻得像风从耳畔掠过,藏着闺阁女儿的娇羞;“莺”要沉,沉得让鼻腔共鸣托住那份柔婉,不疾不徐;最后一个“莺”字拖腔时,气息要像抽丝一般,既不能断,也不能泄,最后缓缓回落,似有若无,却把满腔的心事都唱得淋漓尽致。

年轻时练吐字,章华琴对着镜子反复打磨,每个字的声母、韵母都要咬准嚼透,就连气息的起落、拖腔的长短,都要反复练习上千遍。“师父说,声音要像江水,有源头、有去处、有力量,不能飘,也不能散。”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全靠师父口传心授,一段戏,师父唱一遍,章华琴跟一遍,直到声线、情感都与角色融为一体。

这份“替人而活”的功夫,章华琴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徒弟们。2007年,新昌调腔招收第七代传承班学员,13岁的王嘉瑜走进艺校。第一次听见调腔的瞬间,她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那声音像从古代直接钻进耳朵里,清越又绵长,我突然懂得了什么叫‘此曲只应天上有’。”她拜入章华琴门下,主工刀马旦。

师徒俩的日常,几乎都泡在排练厅里。章华琴教戏,不止教唱腔,更教角色的魂。“师父说,崔莺莺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眼神不能飘,看人得从眼角慢慢地转过来,像月光从云里透出来,柔而有韵。”有一次,为了打磨一个音,王嘉瑜反复练习到声带疲劳失声,医生叮嘱她必须禁声休息,可她心里惦记着排练,稍好一些便又回到了排练厅。

2025年10月28日,新昌调腔剧团首度登上国家大剧院,献演全本《北西厢》。王嘉瑜声线微颤,满含不舍,将少女柔情与怅惘演绎得入木三分,台下瞬间响起热烈掌声。

那一刻,王嘉瑜心里想:成了!六百年前的调子,今天还能让人心动。

藏在后台的“声”力军

“肝肠绞,箭穿心,十万灾民皆生灵。”排练厅内,唱词甫一落定,帮腔应声



排练《闹九江》。

本报记者 金汉青 摄

而起,或高八度假嗓破空而出,或层次分明相随呼应,将《甄清官》戏段中开仓放粮的赤诚与悲怆推向极致。

新昌调腔舞台上有一群身影,隐于幕后,以声为桥,串联起戏里的悲欢离合——他们便是帮腔艺人。前台演员引吭高歌,他们于幕后应声相和,有时重复关键唱句,锚定剧情核心;有时补白角色心绪,勾勒内心波澜;有时以一缕气息轻绕,烘托舞台意境。

帮腔的根脉极为悠远。史料记载,调腔帮腔承袭南戏余韵、融合弋阳腔特色,经数百年淬炼,形成“后场帮唱”与“后场接唱”两大范式,细分短韵、中韵、长韵等诸多形态,成为调腔音乐结构的核心支撑。

看似简单的衔接,藏着的是千锤百炼的唱功,对节奏、情绪的极致把控,更是岁月沉淀的默契。

一出新昌调腔大戏里,后台帮腔是隐形的“气场担当”。十二名艺人成组,四男四女,声线相融,各司其职,高低错落间,撑起了整出戏的声韵骨架;若要渲染磅礴气势,便再添人手,人声交织,层层递进,将调腔独有的古朴苍凉、雄浑悠远,铺展得淋漓尽致。

这些幕后艺人多是剧团里的“多面手”,唱得帮腔,奏得乐器,演得角色。

53岁的王益莉,便是这群帮腔艺人中的一员。排练时,她总爱摸一张曲谱,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每一句帮腔的轻

重、气口和情绪,就连哪里该换气、哪里该轻颤,都写得清清楚楚。

在王益莉眼里,帮腔是调腔的魂,磨的是心性,练的是功力,藏的是热爱,“帮腔要跟着角色和情绪走,把自己揉进戏里,让观众听着入戏,摸着戏里的温度”。在一次演出中,主演稍微加快了唱腔节奏,帮腔艺人们瞬间心领神会,同步提速,没有出现一丝差错。

曾有年轻演员发问:“在幕后帮腔,不觉得亏吗?”一位老帮腔演员淡然一笑:“亏什么?站在他们身后,就是站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

面孔越来越年轻

新昌调腔仍以深厚的艺术积淀滋养着周边剧种:宁海平调是其直接分支,越剧、台州乱弹、瑞安高腔、绍剧等,也从它的剧目编排、声腔韵律与表演程式中汲取养分。

同许多传统戏曲一样,新昌调腔也曾陷入“台上冷清、台下寂寥”的困境。“20世纪八十年代,全县能完整唱完一本《北西厢》的,只剩七八个老艺人。年轻人嫌‘唧唧呀呀’听不懂。”新昌县调腔保护传承发展中心负责人俞臻杰的话语里,藏着那段清冷岁月的印记。2006年,新昌调腔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次入选既是对其艺术价

值的郑重肯定,更如一声急切的呼唤:再不悉心打捞,这缕悠远古调或将成绝响。

转机藏在“活态传承”的坚守与后继人才的培育中。如今,在新昌调腔的戏台上,面孔越来越年轻。算上2020年起培育的新生代学员,已有八批传人循序接棒,形成稳定的中青少三级梯队,活跃在舞台上的演职人员逾百名。

在“人”的接力之外,对“艺”的抢救性保护同样刻不容缓。当地启动了《新昌调腔曲牌抢救工程》,目前已完成300多支珍贵传统曲牌的高清录像和唱腔、曲谱的数字化采集与归档工作,如同为古老曲牌建立了“数字基因库”。

2025年国家大剧院新昌调腔专场演出结束后,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不少年轻观众围着主演要签名,他们大多

是从短视频平台刷到演出信息,特意购票前来观看。

如今,新昌调腔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两度亮相国家大剧院,更远处法国巴黎唱响古韵新声。随着演出场次逐年攀升,去年全年演出已突破130场,戏迷队伍不断壮大。眼下,剧团正计划打造专属文旅IP,开发系列文创,推动调腔艺术与本地文旅深度融合,让这一古老剧种的影响力持续延伸。

一脉相承的古调,在代代相传中焕发新生。



《北西厢·请生》剧照。新昌调腔剧团供图

一场持续近半世纪的捐赠,一腔传承中华文化的赤诚

10053枚古泉,串起的不止货币史

■ 本报记者 徐坊 通讯员 沈夏霞

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的贾家弄里,青石板路还透着隔夜的湿气。弄堂深处有座老宅,来客一拨接一拨。他们是为了古泉而来。

“泉”是古钱币的雅称,取自“泉水如流,流通四方”之意。老宅曾经的主人沈子槎曾先后向各地博物馆捐赠古钱币11次,共计10053枚。这些捐赠中,不乏像“大泉五千”与“大夏真兴”这样的珍稀古钱币。

一枚枚穿越千年烟火的古泉,就像历史打下的绳结,诉说着岁月舍不得言不尽,却又怕被遗忘的故事。

一枚铜钱藏乱世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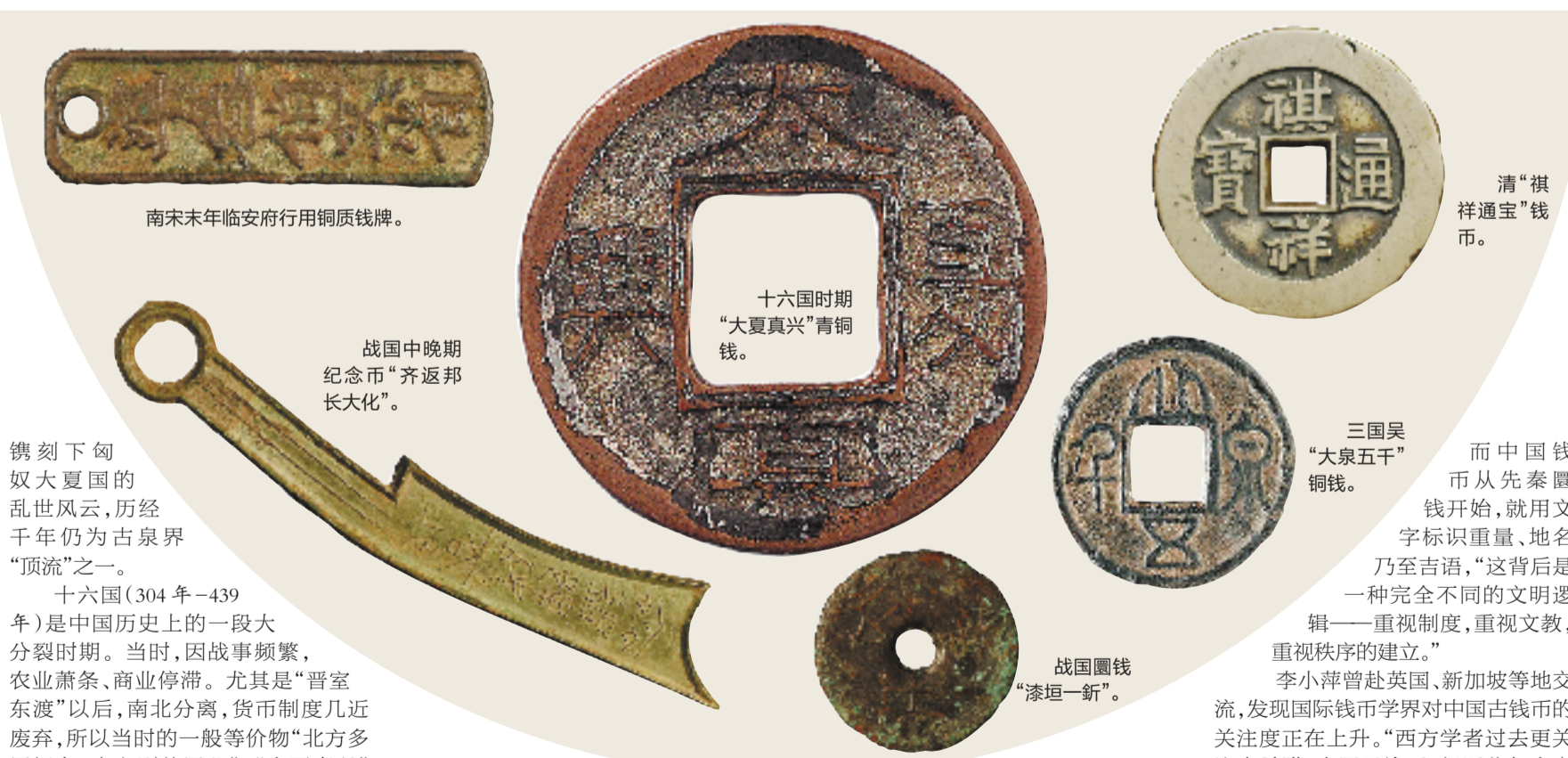
每一枚钱币里,都藏着一个朝代的呼吸,一方水土的兴衰。

沈子槎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湖州双林镇人。他十五岁便辞别母亲,独自赴上海绸庄做学徒,后与人合资创办大丰府绸庄。迷上古钱币时,他已年过半百。当时正值中国钱币收藏的黄金时代,南北藏家各领风骚,北方有方若、罗振玉等金石大家,南方则有张叔驯、陈仁涛等实力藏家,湖州一地亦走出了刘体智、周庆云等收藏名家。

沈子槎的收藏不求面面俱到,而重在“珍”与“稀”,凡能填补历史空白的品类,他必倾力搜求。每得一币,他都反复揣摩形制、材质、文字、铸造工艺,按年代排序,亲手撰写说明。他要将这些零散的器物,穿成一条完整的链。新中国成立后,沈子槎决定将耗费数十年心血整理的古钱币编年藏品全部捐赠给国家。

他捐赠的藏品中,有几枚稀世珍品,在学界赫赫有名。

夏真兴年间(419年-424年),一枚“大夏真兴”钱币在统万城(今陕西靖边)的夯土间诞生,成为中国钱币史上国号年号合铸的开山之作。它以方寸铜身,



篆刻下匈奴大夏国的乱世风云,历经千年仍为古泉界“顶流”之一。

十六国(304年-43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当时,因战事频繁,农业萧条,商业停滞。尤其是“晋室东渡”以后,南北分离,货币制度几近废弃,所以当时的一般等价物“北方多用绢布,南方则兼用谷”。“大夏真兴”青铜钱存世极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一枚为沈子槎捐赠,钱径仅2.3厘米,重2.2克。方寸之间,“大夏真兴”四字旋读,笔画纤细如发,隶楷相间,带有魏碑风骨。这枚小小的钱币,不仅让人重新认识夏国的经济水平,更填补了十六国时期货币史的一段空白。

在古钱币收藏界,“大泉五千”则是传说级别的存在。它是三国吴所铸圆形方孔大钱。因铸期短暂,发行量低,存世极罕,经权威考证确认真品者仅有两枚,其一就是沈子槎旧藏。

孙吴年年用兵,造成财政困难,为弥补亏空,从232年起,先后铸虚值“大泉五千”一枚当千枚五铢钱。孙吴试图通过货币手段掠夺民间财富。百姓对这种虚

值大钱非常抵制,“大泉五千”于赤乌九年(246年)被收回。1959年,沈子槎将一枚“大泉五千”捐予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如今,它静静地陈列在展柜之中,像一面穿越千年的镜子,为我们照进孙吴末年币制崩溃的隐秘历史。

缝补历史的时间线

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钱币学会金银货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小萍,与古钱币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她1986年进浙江省博物馆,第一件事就是给馆藏钱币写“小纸条文物卡片”——为每一枚标注名称、年代、来历。这批钱币里,有大约1500枚来自

沈子槎的捐赠,“沈子槎先生捐献的钱币,奠定了浙江省博物馆钱币收藏的基础。”

在她眼中,古钱币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意义。“一枚钱币,就是一个文明的切片。上面有文字,有铸造工艺,有金属配比,甚至能看出一个时代的审美。”

譬如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的“战国齐返邦长大化”六字刀,即为沈子槎旧藏。此币因币面铭文“齐返邦长大化”六字而得名,是田和被列于诸侯,建立齐国时所铸的开国纪念币,被我国钱币学界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纪念币。

“中国古代钱币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是‘文字钱’。”李小萍说。古希腊、古罗马的钱币上刻的是统治者头像,

清晰、连贯、有实物支撑的中华文明时间线。”

延续44年的捐赠

沈子槎故居的二楼,悬着一块匾额,上书“积善余庆”四个大字,是从旧居拓印下来的。“祖父通常一边整理,一边捐赠,每集齐一套便送交博物馆。”沈子槎最小的孙子沈葵说,沈子槎的捐赠持续了多年,其中一套“历代货币标本”是沈子槎自1960年前后开始整理,至临终前仍未完成。他在遗嘱中特意嘱托儿子沈善齐,将所有钱币捐给国家。

沈善齐秉承父志,逐枚枚校,终成一套精美珍贵的古钱币(共计32版,1644枚)。1998年,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董德义,在沈善齐家中得见这套古钱币,写下鉴定意见:“这套藏品均为真品,其中并有许多珍贵品。从远古商代贝币开始,直至清末,比较齐全完整,很是罕见……不仅是研究我国货币史的实物依据,也是研究历代政治经济状况的重要资料。”这套古钱币最后入藏中国钱币博物馆。两代人一起,完成了一场延续44年的捐赠。

这几年,双林镇在文化遗产保护上花了大力气。沈子槎故居修缮开放后,将沈子槎的生平事迹与捐赠故事整理成展陈,让更多人了解这位“红色商人”的家国情怀。每逢节假日,总有中小学生学习组团来故居参观,沈子槎故居的主理人沈庆跃便成了义务讲解员:“‘树德堂’里传统的,不仅是一段家族往事,更是一种将私藏化为公器、让文明薪火相传的精神。”

泉,亦通“全”。沈子槎穷尽半生搜求古泉,所求者,不过一个“全”字——全其年代,全其脉络,全其对中华文明的一份赤诚。那10053枚古泉,串起的不只是一部货币史,还是一个民族从未断过的文脉。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